

爱情这样的主题，显然与武田其人以往的“中国文学研究会”经历、从军体验和上海殖民文化机构的工作经历难以匹配；也就是说，他的小说创作理念除了转向北原武夫所倡导的设定“第二个我”的目标出发以外，似乎没有更具现实的或建设性的便捷出口。因此可以说，他在1947年相继发表侵华战争题材小说《审判》、《蝮蛇的后裔》，毅然踏上小说家之路，便是武田泰淳的生存哲学遭遇时代现实而交相辉映的必然结果。

### 一 《蝮蛇的后裔》的故事背景与梗概

武田泰淳的大部分战争题材小说，确切地说应该从属于战败题材小说的范畴。他作为“第一战后派”小说家的文学创作发轫于1947年；同年4月武田在期刊杂志《批评》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审判》，这是武田泰淳自1946年初春从上海返回日本东京后在文坛围绕侵华战争话题的首次发声。继短篇小说《审判》之后，他又于同年8月发表了另一部享誉文坛的中短篇小说《蝮蛇的后裔》，这两部小说很快便引起了日本文学界、学术批评界的注目。可以说这一文学活动也为武田泰淳切实迈入“第一战后派”作家行列打下了最初的基盘。如果说武田泰淳最初的小说作品是在设定“第二个我”的理论倡议下，解构和重建自己以往人生体验和战争体验的产物；那么，《审判》中主人公“二郎”在侵华战场上枪杀无辜中国老年夫妇的告白，至少还停留在侵华日军士兵个人反省战争罪恶的范畴之内；作者在小说文本叙事中呈现的“加害者”忏悔与精神救赎的逻辑，还略有生搬硬套陀思妥耶夫斯基

《罪与罚》文学思想的嫌疑。因为，《审判》中的“我”即另一位主人公“杉”，作为主人公“二郎”枪杀中国人事件的知情者、倾听者，还比较侧重自己朋友“二郎”在战场上枪杀无辜中国平民，接受着自我审判“罪与罚”式的文学勾勒；武田泰淳在小说《审判》的文本中，显著地呈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心理的文学模拟和嫁接手法，“二郎”两次开枪时的心理变化和“二郎”痛下决心解除同“怜子”姑娘的婚约，最后“二郎”不辞而别、想要留在中国寻求精神的救赎才是作者要表达的核心思想。

1947年8月至10月《蝮蛇的后裔》连载于期刊杂志《进路》，这是武田泰淳继小说《审判》之后的另一篇战败题材小说，《蝮蛇的后裔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，日本青年“杉”带着战败国戴罪侨民的卑微情绪，在上海过着百无聊赖的难民生活。此时的“杉”，已无暇眷恋曾经在日本占领军庇护下坐享其成、优哉游哉的日子。面对物价日益飞涨、日常生活捉襟见肘的现实窘境，他不再有任何现实理想与人生信念，为了能喝上一口绍兴老酒、吃上一口带荤腥的饭菜，他便利用自己通晓汉语的特长，做起了给日本侨民代写书信或中文申请材料的业务。在武田泰淳的上海时代，他同小说主人公“杉”一样，的确曾经为谋生计给上海的中国侨民提供有偿服务，帮助他们做过代写中文书信、材料的工作。<sup>[2]</sup>从此“杉”在上海的生活总算多少有了起色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他的日常生活因一位美丽的有夫之妇“她”的到访打破了原有的宁静；“她”